

以燕嶺園為例看東莞於改革開放以來 與港商的交流及發展

梁宇聰 LIANG, Yucong (17226481)

中國社會歷史人類學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以燕嶺園為例看東莞於改革開放以來與港商的交流及發展

本報告以燕嶺園為起點，通過這個起點的每一個發展階段輻射到整個東莞於改革開放時期的發展歷程。燕嶺園的發展歷史與港商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本報告將以燕嶺園的變遷為契機聚焦於港商與東莞於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及交流關係，並探究港商的角色對東莞發展的影響，貢獻；並在研習過程中發掘港商於發展東莞中所展現的情，即同胞之情，故鄉之情等。

本報告先從燕嶺園的緣起引入，然後承接燕嶺園原址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再引申至東莞的外商經濟發展狀況。一個健全的地區、經濟、文化、環境衛生等元素缺一不可，而港商對社區設施的貢獻也是本報告的重要一環，並可從中窺豹一斑，看港商對東莞的情懷。

燕嶺園的前身只是一處小山丘，當地人稱為石井嶺¹，是石排的最高點。最先開發燕嶺原址的是自學成才大學。根據林包惠先生（前燕嶺賓館經理，下稱林經理）的口述歷史：改革開放不久，1985年自學成才大學（暨南大學分校）開辦，卻因財政問題而無力支撐校園運作，營運兩年而於1987年結業。政府見此地荒廢而原有校園設備完善，便覺其浪費，故此當地鎮長召集人員，包括林經理到惠州烏山浸溫泉商討發展大計，林經理稱之為「洗腦」，商討開發燕嶺。於是項目隨即上馬，在善用原有校園設施之下，得香港商人投資而新建一棟住房大樓。燕嶺賓館大概於1988至1989年間發展起來，當時身為廣東省省委書記的習近平父親，習仲勛，與林經理等人召開會議，要求林經理等地方工作人員要做到「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中央有了政策，地方就應該舉一反三，在中央政策的指導下進行發展工作，要做到「靈活政策，征靈活」即是使得中央的政策得以靈活地實行起來，進一步還要征服現階段的靈活，而達志更高更好的

¹ 廣東省東莞市地名委員會編：《廣東省東莞市地名志》（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頁242。



成果。在習仲勳的指導思想引領下，林經理等人進一步推展燕嶺賓館的發展，於是疏通了有關的政府部門，又在政府支持全面發展經濟的情況

下，取得了工商局批發的全市第二個工商資質牌照的桑拿酒店娛樂場所，成為地區上改革開放的一個榜樣，周邊地區，如來自虎門等人紛紛駕車來見識參觀，燕嶺賓館每日的營業額有大概二十多萬，這個數目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來講是相當可觀的。桑拿、餐飲、舞廳一應俱全。除了當地權貴，燕嶺賓館還招待了來自香港的同鄉會，僑聯會等會員。因燕嶺賓館興旺，整個石排地區都人流暢旺，店舖林立。

（上與下圖為林經理口述歷史）



對於林經理上述的歷史陳述，也有可商榷之處。在國家全面展開改革開放

時，為推動經濟發展，當時 1985 年前還是縣級的東莞縣政府經已在改革開放的框條下，進一步靈活地處理外商投資的程序手續，在客觀因素來說，外商並不需要額外疏通政府機關人員，例如《南方日報》在 1984 年 7 月 1 日的報道指，東莞縣縣長鄭錦濤跟港澳與內地共五十多名記者介紹了該縣的經濟建設概況，歡迎外商前來東莞投資，並重點宣佈了十項（十條）外商投資辦廠的優惠待遇。其中的優惠待遇第九條：簡化手續，提高效率。在洽談簽約、工商登記、投保、報關等各種手續及時辦理，給予方便。²又例如《南方日報》在 1984 年 6 月 27 日的一篇，標題為「當天談判 當天批准——省人大代表、東莞縣外經委副主任蕭樹棠暢談改革」的報道引述蕭樹棠的說話指出：「東莞縣委和縣政府，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堅決執行黨的政策，有膽有識，主動撤卡解索，方便外商。因此，東莞縣的對外經濟活動，贏得外商的好感，認為手續不那麼繁瑣，能迅速見效，因而都樂於來東莞洽談生意。」³，值得一提的是《南方日報》是一份政府機關報章，是政府政策對外宣傳媒介。⁴從實際數據上看，《羊城晚報》在 1991 年 3 月 13 日的一篇，標題為「東莞外商投資再現好勢頭」的報道指出：「據有關部門的統計，已領取新的營業執照的『三來一補』企業有 248 家……最多的一天，就有 23 家來料加工企業前來登記領取執照……當天審核，當天發營業執照。」⁵由此可見，早於 1984 年東莞縣政府已經大幅度地簡政放權，以吸引外資，所以林經理所指的疏通政府人員的行為大概在東莞整體來說，理論上是不存在的。

而對於自學成才大學與燕嶺賓館的營運日期，林經理的說法，即 1988 年，與燕嶺園官網的說法有不同，但相差的年份也不遠，（下圖為自學成才大學校

² 東莞市人民政府辦公室、東莞市檔案館合編：《東莞改革開放紀實》（出版社不詳，1993 年），378 頁。

³ 東莞市人民政府辦公室、東莞市檔案館合編：《東莞改革開放紀實》，頁 376。

⁴ 蔡銘澤主編：《新時代廣東報業發展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16-17。

⁵ 東莞市人民政府辦公室、東莞市檔案館合編：《東莞改革開放紀實》，頁 385。



長) 燕嶺園官網
指燕嶺賓館在
1985 至 1986 年開
始設立住房部，
正式全面營業；
二者皆在改革開
放之後，即 1988
年，所以無論從
國家政策或是地

區政策大趨勢來講，兩段時間的不同對討論港商對東莞的貢獻，影響不大。

燕嶺原址的發展實際是東莞整體經濟發展的一個縮影。那麼取其兩個時間的中段，即 1986 年以論證在外企經濟的帶動下為東莞帶來豐碩的成果。《南方日報》1987 年 1 月 31 日的一篇報道⁶「在 2465 平方公里的東莞土地上，分佈著 8000 多家外商投資工業企業，這些企業，構成了東莞外向型經濟的主體」⁷東莞縣外向經濟主體為國家帶來創匯二億二千零五十七萬美元，比歷史最高的 1985 年增長 30.4%，居全省縣（市）級之冠。又例如《羊城晚報》港澳、海外版 1987 年 1 月 24 日的報道⁸指：「在開放、改革、搞活的方針導引之下，善用毗鄰港澳的交通便利優勢，積極發展輕工業如箱包、勞保用品的生產和出口業務。截止截稿日期，該類工業類生產廠家已發展到一百家。去年全年的出口達一百七十五萬多打，出口值達到七百七十五萬多美元。」由此可見，林經理指出石排鎮市道蓬勃的現象也不無道理，一方面大概是因為燕嶺賓館的經濟活動帶動，另一方面主要也是在改革開放、東莞銳意進取、縣鎮政府不甘落後，振作圖強亦望富民的大環境氣氛之下而帶起欣欣向榮的氣候。

⁶ 東莞市人民政府辦公室、東莞市檔案館合編：《東莞改革開放紀實》，頁 372。

⁷ 中共東莞市委辦公室編：《從農村走向城市》（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45。

⁸ 東莞市人民政府辦公室、東莞市檔案館合編：《東莞改革開放紀實》，頁 371-372。

那麼在王錦輝接手後的燕嶺原址又有什麼發展呢？和他一般的東莞華僑港商又為故鄉帶來多少經濟貢獻呢？

踏入燕嶺原址的第二個發展階段，即王錦輝接手燕嶺賓館之後。其接手燕嶺賓館也並非無緣無故。根據林經理的口述歷史：在未解放之前，王錦輝仍是小朋友，石排鎮發生了大水災，王錦輝家園盡毀，於是他為避水災而走難到石井嶺而得以保命，便認為此處乃其福地，埋下接手燕嶺賓館、興建金城台的種子。在大躍進發動之前，1957年，王錦輝、王仲銘逃難至香港；這時候逃港的多是有錢人。大躍進過後，由於生活極度困難，便有更多青年人群起而逃港，以石排為例，每一個家庭均有逃港的青年，若果有一家的青年沒有逃港，則會被看不起。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勛於深圳時見對面香港粉嶺漫山遍野皆是逃港的內地青年，人頭湧湧，去勢洶洶，即便將逃港青年逮捕，也解決不了問題，於是便任由他們，放人到香港。當時林經理被委任去逮捕逃港分子，但林經理拒絕逮捕他們，認為他們只是為了改善生活，他們將來會成為華僑而貢獻反哺故鄉東莞。

對於大躍進之後的逃港潮確如林經理的口述歷史情況一般，根據《共產黨員》期刊2007年07期〈“內地逃港潮”檔案解密〉的資料指「從1961年到1963年間，共有16萬人逃到香港」、「《1979—2000 深圳重大決策與事件民間觀察》一書描述，在5月6日這一天，來自惠陽、東莞、寶安3個縣80多個鄉鎮的7萬群眾，像數十條兇猛的洪流，黑壓壓地撲向深圳，兩個海防前哨不到半個小時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第二天，毗鄰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著數百具屍體，景象慘不忍睹」⁹可以論證改革開放之前，東莞乃至廣東的逃港人數之多。

林經理繼續講述當年。逃港的青年人在改革開房之前是回不了家鄉的，只好寄物資回去。改革開放之後，鄧小平南巡，摒棄前嫌，不再追究那些青年；

⁹ 梅州日報：〈『內地港潮』檔案解密〉，《共產黨員》，2007年第七期，頁56。

從前逃港青年人，到了那時便是闖出一番事業的東莞華僑，他們趁國家開放改革的難得機遇，都紛紛回到東莞：小的便投資幾十萬開一家小店，多的就開設廠房，譬如：五金廠、紙箱廠等。王錦輝還帶來一批香港投資者來投資石排建工廠，因改革開放的緣故，同時期東莞其他城鎮也紛紛發展了港商投資企業；那個時候最多的工廠是從事來料加工。



（上圖為東莞一工業企業車間）

林經理那些年的當機立斷，拒絕逮捕逃港青年，果然為東莞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好處。下面先說王錦輝的貢獻再引出其他港胞的例子，以論證港胞的確貢獻回饋故鄉良多。據林經理口述，在他的帶動下，王錦輝連同王仲銘，每人以投資的方式資助了石排鎮各一千多萬港幣，並且將燕嶺賓館發展得有聲有色，也吸引了一大批投資者仿效而推動了石排地區。那麼在整個東莞而言，根據中共東莞市委辦公室的資料¹⁰指九十年代初，東莞擁有大少企業 25000 多家，其中「三來一補」和「三資」企業有 8000 多家，每天有 3000 車次貨物進出口，每年要進口 30 多億美元的原材料，每年出口創匯 10 多億美元。在東莞這個小小的地方……各項存款餘額 180 億元，有 230 多萬人口在這裡生活。接著市委辦

¹⁰ 中共東莞市委辦公室編：《從農村走向城市》，頁 36。

公室繼續指，外商投資熱情將進一步高漲，投資行業、數量、技術含量和規模將會增加。市委辦公室特意指出原來每十個香港人，就有一人是祖籍東莞。而十多年來的，實際利用的外資 18.4 億絕大部分來自香港¹¹；又指目前東莞的外資項目，港商的投資項目在數量上和金額上均占 80% 以上¹²。由此可見在香港的東莞華僑對故鄉的經濟貢獻是多麼的大。直至千禧年，市委辦公室的統計指出祖籍東莞的港澳同胞有 75 萬人。到 2000 年，東莞全市外貿進口總額 320 億美元，增長 12.6%，有 22 家外貿公司、22 家外商投資企業進入全國 500 強和 200 強，有 14 家外資企業成為全國最大 500 家外商投資企業¹³。大概東莞港商僑胞對這些經濟成果也有不可磨滅的貢獻。改革開放沿海經濟特區的貿易模式，一方面吸引了港商投資，一方面也證明了東莞人飲水思源的精神。

除了經濟上的貢獻，港商對東莞社區設施的建設也顯示了其對故鄉的濃濃情意。



（上圖為東莞石排一工業企業）

¹¹ 中共東莞市委辦公室編：《從農村走向城市》，頁 46。

¹² 中共東莞市委辦公室編：《從農村走向城市》，頁 102。

¹³ 廣東年鑒編纂委員會編：《廣東年鑒（2001）》（廣州：廣東年鑒出版社，2001 年），頁 482。

林經理指：燕嶺賓館於 1997 年結業了。林經理他發動僑居香港的東莞商人，以王錦輝為主，兼及王仲銘捐款 1200 多萬興建石排醫院，捐款 50 多萬建石排中心小學、東莞理工學院。其他的東莞華僑港商對故鄉捐輸的例子，如《羊城晚報》海外版 1981 年 10 月 25 日的一篇報道¹⁴：港胞葉錫森、葉美勝等一百三十多人集資港幣三十七萬重建的東莞縣茶山公社京山大隊京山小學；同報刊於 1986 年 4 月 26 日的報道¹⁵：方樹泉是東莞河田鄉人，早年旅居香港……一九六四年捐資在家鄉辦了一所『肇彝小學』……接著，又捐資四十五萬港元將『肇彝小學』改鍵為『方肇彝中學』；不久，他再次捐獻四百萬港元在家鄉興建一所現代化園林式醫院。上述例子可以見到港胞對東莞故鄉的情意並不是單單的只拋下一大數目的鈔票就了事，他們對故鄉的關懷反而是有遠見的，是超前的，因為他們想到了如果要自己的故園真的發展起來，富樂安康起來，成為港胞一樣就必須從現在開始改善家鄉孩子的知識水平，讓他們能夠，以知識改變命運，他日成就一番偉業，一代接一代，前赴後繼地貢獻故鄉，也使故鄉得以揚名於世。

以上是在剛開放的時期，港胞所表現的，是具有遠見慧眼的故鄉同胞之情。到了現在，東莞已經成為一個整體社會經濟教育文化十分健全的城市，然而她與其他有相當程度發展的城市一樣，出現了人口老化的問題，由於社會的發展中心仍舊聚焦於經濟，對於老人設施服務兼顧不暇。於是港胞於此伸出了及時的援手，例如來自東莞市僑聯 石排鎮僑聯網站 2019 年 4 月 4 日的信息指：東莞市僑聯榮譽主席王賜豪為石排新敬老院建設追加捐款。為家鄉石排鎮新敬老院建設捐款 121.99 萬元基礎上，今年他又為追加捐款 78.01 萬元，累計捐款達 200 萬元人民幣。這也是同胞之情的一種體現。

¹⁴ 東莞市人民政府辦公室、東莞市檔案館合編：《東莞改革開放紀實》，頁 218。

¹⁵ 東莞市人民政府辦公室、東莞市檔案館合編：《東莞改革開放紀實》，頁 222。

總結，現在燕嶺原址經已發展成為集文化創意於一身的燕嶺園，東莞的經濟也由從事低技術的三來一補轉型也逐步向著高增長技術製造業發展，以石碣鎮為例，一批有實力的企業採取機器換人、引進技術等方式就地升級¹⁶。燕嶺原址在改革開放的不斷嬗變中，東莞也在如巨輪般熱烈地旋轉，燃燒其勞動人民的機油，取得了萬眾矚目的成就。而港商始終在東莞的發展上發揮著如巨輪上的齒輪一般，緊緊聯繫著彼此的生命動力。港商對東莞的經濟貢獻，社會貢獻，雖則是一連串龐大的數字，但這數字卻是溫暖的。



（上圖為燕嶺賓館住房樓）

¹⁶ 《財經》雜誌；宋斌斌編：〈東莞模式：中國製造業升級的樣本〉，《經濟導刊》，2016年第三期，頁9。

引用書目

專書

1. 中共東莞市委辦公室編：《從農村走向城市》。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2. 東莞市人民政府辦公室、東莞市檔案館合編：《東莞改革開放紀實》。出版社不詳，1993年。
3. 廣東省東莞市地名委員會編：《廣東省東莞市地名志》。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
4. 廣東年鑒編纂委員會編：《廣東年鑒（2001）》。廣州：廣東年鑒出版社，2001年。
5. 蔡銘澤主編：《新時代廣東報業發展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期刊

- i. 梅州日報：〈『內地港潮』檔案解密〉，《共產黨員》，2007年第七期，頁56。
- ii. 《財經》雜誌；宋斌斌編：〈東莞模式：中國製造業升級的樣本〉，《經濟導刊》，2016年第三期，頁9。

